

# 我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及跨越路径选择

朱尔茜

(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重大现实风险。从现象上看,它是“停滞性陷阱”;在本质上,它是“转型陷阱”,是新旧发展模式之间的转型鸿沟。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通道且缓慢下降,需求侧增长动力减弱,表现为投资效率递减,出口增速下滑,消费始终未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内生动力;供给侧要素增长乏力,表现为劳动供给总量与结构“双短缺”,投资增长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双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滑,我国已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兆。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价格体系、财税金融、社保制度、科教体制、国有企业等领域改革;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准确定位产业政策,努力实现“包容性增长”。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路径

**中图分类号:**F 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2-0077-05

##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最早出自世界银行报告《东亚经济的复兴》,其基本涵义是:一个经济体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长期难以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sup>①</sup>。对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人民论坛》曾征求国内50位知名专家的意见,提出了十个方面的特征: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sup>②</sup>。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年公布的报告,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0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在1006-3975美元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976-12275美元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12276美元及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

纵观国际经济史,绝大部分国家在发展中都会

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比较典型的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直到现在,其人均国民收入仍在3000-10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徘徊。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已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共识,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理念和知识框架。

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视为“停滞性陷阱”,如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在某个阶段的增长驱动因素问题<sup>③</sup>,马岩(2009)认为实质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或“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较高速增长”问题<sup>④</sup>。二是看作经济发展问题,如蔡昉(2008)将“中等收入陷阱”纳入发展经济学范畴,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该因素不可持续,其他制约因素又抵消了其作用,把人均收

收稿日期:2016-01-10

作者简介:朱尔茜,经济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从事经济理论、区域经济研究。

人拉回到原来的水平<sup>[5]</sup>。郑秉文(2011)也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外部环境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sup>[6]</sup>。三是认为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如江时学(2011)认为,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述含混,事实上低估了社会经济发 展的艰巨性,导致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焦虑症,片面追求 GDP 甚至陷入崇拜<sup>[7]</sup>。刘福垣(2011)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任何国家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sup>[8]</sup>。总之,不同学者结合自身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理解,从增长动力、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公共服务、技术创新等角度都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应该说,“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从现象上看,“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停滞性陷阱”,但从本质上看则是“转型陷阱”,是新旧发展模式之间的转型鸿沟。

事实上,随着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确实逐渐表露出来。面对这一难点问题,如何在发展模式上成功转型,完成“惊险的一跳”,就需要我们对风险做出进一步分析,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来。因为转型的最大风险是经济失速,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手段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我国成功应对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逻辑,其对“十三五”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 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分析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738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自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当年GDP增长9.5%。从2012年起,经济增速进入7-8%的通道且缓慢下降,2015年GDP增速进一步降至6.9%。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等主要指标同比增速持续下台阶,出现“停滞性陷阱”的前兆。

### (一)需求侧增长动力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低水平起步,面对市场供需不平衡、总供给严重不足的大环境,逐步形成了“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机制,拉动经济实现了30多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其特点是: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设计专注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核心指标,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随需求粗放式投入,技术主要依靠引进,国家发展面貌和人民生活快速改善。但目前来看,依靠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已经趋弱,“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机制难以为继。

#### 1.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呈现递减趋势

制造业领域的过度投资催生了大量过剩产能,2015年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到74%左右,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行业产能过剩尤为突出。在基础设施领域,形成了大量低效甚至无效的项目,如无效益的广场、交通流量很少的公路、高空置率的空城等;低水平的投资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许多地方的大气、土地、水资源等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极限。

#### 2.出口继续大幅增长越来越困难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我国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以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基本消失;不少加工制造业领域的技术水平已处于世界产业发展前沿,继续从发达国家引进核心和尖端技术变得愈加困难;发展中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外部竞争的环境,出口持续大幅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

#### 3.短期内还难以靠国内需求驱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过程中,消费始终未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内生动力。受投资持续大幅增长的挤压,居民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2年的45.3%下降到2014年的37.7%。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2015年基尼系数达到0.462,居世界前列。依靠消费驱动经济增长,需要改变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商品和服务供给条件,这些任务难以在短期内完成。

### (二)供给侧要素增长乏力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市场总供求大体平衡,甚至部分领域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在经典的经济生产函数 $Y_t=A_tF(L_t,K_t)$ 中,长期支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供给条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 1.劳动供给总量与结构“双短缺”

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使我国有效劳动供给状况出现重要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劳动力增势在2012年出现拐点,当年新增劳动力减少345

万人,此后逐年连续下降;到2015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6.1%,65周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0.5%,均超出国际公认10%和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并且带来人口抚养负担的快速上升;随着就业制度变迁、劳动观念转变、社保制度完善,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2004-2014年间已从82%下降到79%。同时,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也很明显,中部地区劳动力的相对供求缺口明显高于西部、东部地区,初级、中级、高级技术岗位供不应求。这表明,支撑我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

### 2. 投资增长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双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09-201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1.7%,对GDP贡献率在40%以上,但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2009-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30.4%、24.5%、23.8%、20.6%、19.6%和15.7%,2015年进一步回落到9.8%,创1999年以来新低。主要原因是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传统行业投资收益率,新的投资增长点还未大规模形成,导致社会投资意愿和能力下降。同时,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市场总供求大体平衡,甚至部分领域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但投资仍保持“惯性增长”,导致资本投入的结构性扭曲问题日益严重,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不断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02年我国投入产出弹性为4.1,到2008年为3.2,2013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4。连续多年的过度投资,使企业和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经济杠杆率不断上升。

### 3. 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滑

全要素生产率是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sup>[9]</sup>。从高投入国家经验看,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据亚洲生产力组织(2014)测算,1970-2012年间,美国、日本、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1%、25%和2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断下降。蔡昉(2015)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从1995-2009年间每年3.9%下降到2011-2015年间每年3.1%，“十三五”时期预计进一步下降到2.7%,使我国经济增速不断下行<sup>[10]</sup>。

综上所述,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疲弱,中长期内资本、劳动等要素供给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已经到了不转型升级就不可持续的关键时期。但与此同时,经济体制转型仍然处于攻坚阶段,发展方式转变处于爬坡状态,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开放方式升级压力重重。如果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转型升级遇阻,我国完全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 三、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通过新旧发展模式的替代实现经济中高速可持续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要求。从我国“新常态”经济现实出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改善要素供给,推进结构性改革,完善政策制度。

### (一) 改善要素供给

改善供给侧要素供给条件,需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三方面入手:

第一,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资本产出效率。通过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严格约束政府直接投资,退出一般经营性领域,全面放开基础设施和垄断行业市场,行政审批不再以投融资项目审批为主,吸引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建立考核投资效果以及投融资债务风险控制的指标体系和制度,对政府自由裁量权建立基准制度,促进完善由市场决定资本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完善政府特许经营机制,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运用设立投资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等方式,提高政府投资质量和效益。

第二,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扩大劳动要素供给规模。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放开落户限制,鼓励劳动力按市场规则流动迁徙;改革影响企业用工选择自主权和投资意愿的劳动合同制度,在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尽可能对劳动力“松绑”,完善劳资双方公平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机制;可借鉴重庆“地票制”经验,农民宅基地还耕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变为资本,可携带入城投资创业,最大程度释放农村富余劳动力潜力。

第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围绕建立市场导向的科技资源配置机制,推动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改革,政府除保基础性、公益性科研机构外,其他均面向市场;发挥教育在知识创

新、技术创新中的支撑作用,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主要按市场需求设立专业、组织教学和学术活动,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把支持创新作为基本国策,借鉴东亚国家发展经验,促进创业投资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发展<sup>[1]</sup>。

## (二)推进结构改革

改革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推进结构改革的重点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体制,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第一,价格体系改革。应放开政府价格管制并尽量交由市场决定,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为结构优化和自主创新提供根本保障;大幅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理顺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价格体系,完善居民阶梯价格制度和物价补贴联运机制;建立健全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政府投入与价格调整相协调机制,规范定价程序,向社会公开价格成本。

第二,财税金融改革。继续实施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的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按照收入中性原则全面完成营改增,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加快环境保护税立法。完善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科学调整各级政府收入划分方式;金融要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允许实体企业财务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组建不同规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解决大银行“缺位”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第三,社保制度改革。养老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扩大个人账户规模、体现精算平衡原则。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与缴费贡献密切挂钩,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体现养老保险多缴多得的激励约束原则;医疗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逐步回调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中政府与个人筹资比例,对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也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

机制,整合形成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第四,科教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重在明确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在重大关键项目上应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推动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改革,引入独立第三方参与遴选和确定重大科技专项及研发方向、路径选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把知识产权的权益真正落实到发明者手中,充分调动科研创新人员积极性。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政府可采取贷款贴息、后补助、提高折旧率、加计扣除等方式,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教育体制改革应以职业教育为重点,强化企业、社会办学作用,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动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切实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实用性。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以处置僵尸企业为突破口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按照市场规律兼并重组和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清理退出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企业和低效企业;通过建立黑、白名单制度,推进银企对接试点,引导信贷资金投向需要重点扶持的技术创新改造、产品结构调整等方向,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 (三)完善政策制度

在提振要素供给与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需要积极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包括需求调节、产业政策、收入分配、绿色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这是在经济中高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确保实现全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内容。

第一,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扩大总需求。未来我国最大的需求潜力在新型城镇化,这也是确保经济换挡不失速的根本保证,只要新型城镇化持续释放投资、消费需求,我国经济就有充足的增长空间和回旋余地。特别是以京津冀、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特大城市为核心,建立三个超级城市,聚集全国约50%以上的人口,60%以上的GDP,把这三个区域打造成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大型城市圈,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释放大量市场需求,可明显拓宽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第二,准确定位产业政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借鉴东亚国家发展微电子、光电、生物工程、信息咨询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经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装备制造业,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实现科技升级和工业多元化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行最严格的土地、水等资源保护制度,通过加快工业化的绿色化改造,实施能源技术创新和能源革命,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同时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环境监控系统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严格环保执法。

第三,努力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以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通过扩大就业,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完善社会分配制度,调节分配结构,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发展机会平等。用法治的思维和手段促进社会发展,鼓励形成“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公务员廉政制度,推动构建成熟的公民社会。

#### 参考文献:

- [1] Indermit Gill, Homi Kharas 等.东亚复兴[M].黄志强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 [2] 高源.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J].人民论坛,2010,(19).
- [3] 吴敬琏.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上海国资,2008,(6).
- [4] 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动态,2009,(7).
- [5] 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
- [6]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 [7] 江时学.真的有“中等收入陷阱”吗[J].世界知识,2011,(7).
- [8] 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J].领导文萃,2011,(19).
- [9] 楼继伟.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J].求是,2016,(1).
- [10] 蔡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着力点[J].中国金融,2015,(16).
- [11] 李佐军.欲跨中等收入陷阱必推要素升级[N].中国经济时报,2015-04-08.

【责任编辑:林莎】

## The Risk of “Middle Income Trap” in China and Its Way out

ZHU Er-qian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Middle income trap” is the biggest realistic risk that “new normal” economy faces. Superficially, it is a “stagnation trap”, but a “transition trap” in essence. It is a transformation gap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economy has declined slowly from fast growth. On one hand, there is less momentum behind the growth in demand, resulting in the decrease of investment efficiency, tumbling exports, and consumption has failed to become a major endogenous motivation. On the other, supply growth weakens, leading to the “double shortage” of total labor force and structure, the “double slowdown” in investment growth, marginal capital efficiency, and declining TFP. All these are precursors to “middle income trap” in Chinese economy. To get out of the trap, we must deepen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reform, increase labor mobility, implement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vigorously promote the reform in price system, fiscal and financial secto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cience and education system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ush forward new urbanization, accurately position the industry policies, and strive to achieve “inclusive growth”.

**Key words:** middle income trap; risk; way out